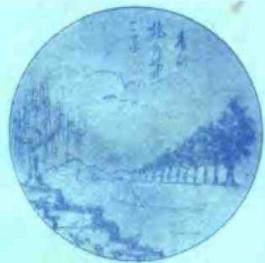


10.07



第二辑

江都文史資料選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江都文史资料选编

江都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都县委员会 编
文 史 资 料 征 集 委 员 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人民群众斗争

- | | | |
|------------|-----|------|
| 吴浩抗租始末 | 吴庭生 | (1) |
| 高汉庄农会的回忆 | 陈柏年 | (4) |
| 回忆挺进纵队休养所 | 陈钟林 | (6) |
| 郭村保卫战时的儿童团 | 杜明甫 | (9) |
| 硫磺脱险记 | 孙竹波 | (12) |

国民党内幕

- | | | |
|-----------------|-----|------|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省、县派系情况 | 杨 谷 | (16) |
| 国民党王、洪、叶三中委轶事 | 刘仁涛 | (21) |
| 江都县议参两会点滴 | 吴建侯 | (25) |
| 土地陈报与大逮捕 | 徐梓彬 | (27) |

文化教育

- | | | |
|-------------------------|-----|------|
| 略谈苏北中学谢桥分部 | 张应天 | (31) |
| 江都县乡区学校联合会和江都县教育会
片断 | 张翼鸿 | (34) |

商业经济

- | | | |
|-----------|-----|------|
| 大桥商抗会及旧商会 | 余捷臣 | (38) |
| 仙女庙钱业兴衰史 | 管希宁 | (41) |
| 杨庄协成合作社简况 | 徐龙章 | (47) |

日寇暴行

- 日寇入侵仙女镇暴行 姜锦文 (50)

帮会活动

- 嘶马镇朱大狮子 许静仁 (55)
青帮的起源及其以后的转化情况 王 进 (58)
江都的大刀会 朱家宽 (65)

地方史志

- 嘶马镇得名之传闻 朱运龙 许静仁 (73)
露筋祠的来历 江月守拙 (75)
林园种花起何时 王祝三 (77)
仙女庙掌故 郭德禧 (79)
宜妃和宜陵 文史办公室 (82)

参政活动

- 回忆我在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参政
活动 雪松 (88)

- 《江都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92)

吴浩抗租始末

吴 廉 生

吴浩吴桥人，家贫无立锥之地，破屋数椽，衣食不周，人皆以为困，浩则泰然处之。浩喜与豪侠游，又有膂力，好鸣不平，乡人争依附之。今所记者乃吴浩抗租事。

浩家吴桥后三庄，三庄中人皆贫穷，所有田地，悉为李氏产。李固豪富，居吴桥东首，田连阡陌，家累巨万，声势赫赫，人莫敢近。会岁饥，李氏逼租紧，穷民无告，唯有一死。浩曰：“交租死，不交租亦死；与其守死，不如抗租以求生。设或有祸，某愿一人承担。”众纷纷响应，于是抗租之计遂定。

初，李氏收租紧，租吏至门，叫嚣隳突，鸡犬不宁。至是，李氏又逼租，群情激愤，越发不可遏。见吏来，蜂拥而上，拳其人，毁其车，砸其斗斛，呼噪相逐，声震远近，租吏皆奔走。

事后，李心患之，遽以所毁租斗上报。官逮吴浩，施酷刑，令交租，不可，便监禁。于是浩乃诡言允应；及归，复抗租。且曰：“李某有何能，至多坐牢耳；牢可坐，租不可纳。”李闻言益怒，以厚币赂官府，欲杀浩以泄忿，犹虑不济，又以重金勾结盐匪，令阴谋害。时天方曙，吴浩起身他出，叔婶及侄犹卧，盐匪至，误叔为浩，捂以被，窒息死，又以利刃杀其婶及侄。浩归，泣曰：“此仇不报，非人也！”乃以棺殓死者抬至李家乞偿命。李不受，讼之官，官得李氏贿，埋冤弗雪。浩又至苏州上诉。苏官亦赃官，非但不公断，反

治浩以诬控罪；充军潼关外。浩既罹祸，李益横，执田复租，搜括无所不用其极，三庄之人更无宁日！

世言吴浩之至关外也，关中豪士，皆乐与之交，又尝助浩共谋复仇事。计议复仇当先入关，关不入，仇何能复？于是计以花轿抬浩，关乃过。

浩既归，乡亲聚拢问讯，纵谈往事，相与泣下。复为浩置鸡酒，酒酣，浩拔刀语曰：“李家吾所仇，苦久不复。今得归，当往除之。”言讫而去。时有邻某者，知李有戒备，恐事不成，反遭其害，急追浩，强令返回。然浩归消息，闹里轰动，李某闻之，仓惶失措，茶瓯堕地，俳优之戏亦止。盖自吴浩充军之后，李氏尝谓眼中之钉已拔，抗租之乱已息，今后可以高枕无忧矣！谁料潼关万里，不能禁吴浩之生还也。

由是，李氏颇畏浩，戒勿生事。且阴使人和善，置酒招浩。浩亦以李氏多备，伺隙不易，不如伪应，就席间行事。及期，浩身怀利器，伺机杀李；李狡猾，避不见。浩无奈，掷杯于地，顿足曰：“此仇不复，永世之恨也！”遂出。然亦以浩故，李氏虽横暴，亦稍自敛焉。

编者按：本文谈吴浩抗租事缺少时间，我们特往访吴桥李康侯老先生，请其作补充说明。承蒙来示如下：“吴浩抗租这件事的时间是在一百年前，我的高祖李之南是其斗争的对象。当时李之南有田二千余亩，他又是一个武生，不但有钱有势，而且有力气，这样在乡里就益加横行无忌了。他于大荒年头还要收租，这就引起吴浩率领佃农抗租。此事既起，李之南益加恼怒，除报官府而外，又贿通仙女团练及盐匪，请其帮同办理，卒至造成吴浩叔父家三条命案。至此，吴浩将死者棺材厝在我家门口，并出面向官府兴讼，计时三年。最使人感到满清政府黑暗者，即在三年诉讼期间，李之

南全未到庭，由家人宗泽林代为到庭。诉讼结果，死者的冤屈未伸，反将吴充军到潼关，殊可慨矣！”

高汉庄农会的回忆

陈柏年

1927年春节后，由于北伐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军心、民心非常振奋，我们家乡一带的农民，情绪也十分高涨。这时以高汉庄为主联合周围的雁荡、石桥、颜塔等几个村庄，组织了一个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刚组建时，在推举理事长人选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斗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那里有个绅士叫李玉生，为了争得农会的领导权，花钱请了不少农民，在本地龙泉茶馆吃了一顿肉包子，想以此来收买人心，拉拢一些人选他当理事长。可是，在开会选举时，偏偏没有人选他，大家都选我做农会理事长。大家为什么会选我呢？因为我当时比较年轻，身体又好，平时对一些看不顺眼的事好打抱不平，喜欢讲义气，和贫苦的农民谈得来，特别是不少的贫苦青年农民，他们都跟我合得来，所以大家推我当理事长。这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

农民协会建起来以后，会址设在高汉庄东边河北的两间草房里，室内悬挂着一张孙中山先生的像，大门外竖了两根又高又大的旗杆，顶上挂着两面新做的比较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农民群众走到这里，都要抬头仰望飘扬在天空的旗帜，盼望北伐革命能够早日成功。

我刚当上理事长时，曾召开过一次农民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六、七百人。会后曾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总共游行了十三个村庄。在游行时，人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

“平分土地，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等口号。同时，一路上还散发了传单，并且在村头的墙壁上刷了很多的大标语。游行队伍每到一村，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到门外争相观看，不少人还自动地参加到游行的行列中来。

正当“大红旗帜迎风扬，男女老少斗志昂”，准备“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干一场”的时候，蒋介石在“四·一二”叛变了，对农民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消息传来，我们这个刚建立不足两月的农民协会，为避开反动派的屠刀，也就自行解散了。

高汉庄农民协会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的革命精神却影响着人们。我就是那年秋天在本乡经人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的。

回忆挺进纵队休养所

陈钟林

1940年夏，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维护民族利益，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抗日，挺进纵队主力部队开始东进。

挺进纵队领导考虑到后方医院的二十多名伤病员不便与主力部队一起东进，决定把挺进纵队后方医院的十多名工作人员与二十多名伤病员组成挺进纵队后方休养所，仍然留在江都。九里沟战斗后，庄秀芳同志又带来九名重伤员，因此这个所的成员共有四十多人。当时由朱宝坤同志担任休养所长，黄德明同志担任医务负责人，由我担任外科负责人。所内的工作人员有罗守迅、孙文娟、庄秀芳、余明章、林志远、吴晓山等十多个同志。休养所留驻江都后，便与金求真、张雷平、王秉华、万道生、丁浩东、何子英、阮建明、李勇（女）等同志组成的抗敌委员会一起行动，并属其领导。后方休养所的一切经费都由抗敌委员会拨给。

当新四军挺进纵队东进后，盘据在吴桥、谢桥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李长江部队便不断地对我根据地与后方休养所进行围剿。处于日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包围与扫荡下，我们的处境异常险恶。根据抗敌委员会的指示，休养所把王克招、张永伟、钱朝炳、严海清、纪学忠等三十多个伤病员分散隐蔽在许家庄、小庄家伙、秦家庄、万家庄、姜家庄、王

玉庄、潘家庄、许家闸、阮家堂一带群众家中。而休养所工作人员则住在阮家堂阮建明同志家与尼姑庵中，每天由我与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巡回医疗。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敌强我弱，我们和敌人尽量避免接触。敌人一下乡扫荡，我们便把药品和一些不便携带的武器藏起来，人员全部撤离，等敌人回据点以后，我们才返回工作地点。有一次，我带着九岁的小鬼吴晓山到小庄家伙去为伤病员换药，不料碰到从宜陵下来扫荡的日寇与汉奸绥靖队。我立即叫吴晓山回阮家堂通知工作人员撤离。自己既被敌人发觉，就一面开枪还击，一面向七里长庄一带跑去，一口气跑了十多里。后来多亏群众掩护，才未被捉。以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我们便转移到小卯庄、毛家桥、段家坝、景家桥一带活动。当时地方群众对自己的部队无比热爱；对国民党反动派却有刻骨的仇恨。自己家里人吃不成，给伤病员同志吃；自己家里人睡不成，把床让给伤病员同志睡。还拼性命替我们通风报信，给我们领路，帮助我们掩埋物资。一遇敌人下乡扫荡，群众便想出各种方法掩护伤病员，解去绑带，换上膏药，说是家里的人在害外症。有些同志是外地人，口音不对，群众就叫他们装成哑巴。

1940年秋季，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了。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地主王恩禄和被我教育释放的反动军官李宝路，勾结李长江部下驻防宜陵的马连长，于1940年农历7月29日在潘家庄暗杀了我休养所所长朱宝坤同志。在这种万分险恶的环境下，我们休养所接到江都抗敌委员会金求真主任的紧急指示，于朱宝坤同志被暗杀的第二天，便撤离江都河南地区，转移到江南新老洲、天福洲、殷家大棚、鄂家大棚一带。当时那一带属于江都三区，区长是吉林同志。

我们到达小江南后，便与吉区长取得了联系，我们的一

切开支都由三区负责供给，在那一带我们仍然坚持分散伤病员，进行巡回治疗的方法。由于日寇与汪伪反复扫荡，我们休养所在经济上很感困难。后来又接到金求真主任的指示，由黄德明同志把一部分痊愈的伤病员与轻伤员带至江南六师十八旅，一部分重伤员仍然住在新老洲、天福洲、殷家大棚、鄂家大棚一带，由我负责，辗转流动。1940年底，三区被侵占镇江的日寇包围，我们休养所的工作人员与伤病员被包围在双烟囱芦柴滩中七天七夜。白天全部在芦柴滩中，只有夜晚才能到附近的村庄上烧饭吃和睡觉，天刚亮又要下芦柴滩。不久吉区长派通讯员与我们联系，把我们带到江北来。以后，我便被调到江高独立营负责医务工作了。

郭村保卫战时的儿童团

杜明甫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七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驻郭村，教导队的一部分同志就驻在郭村小学。这个学校当时是国民党江都县流亡政府办的中心国民小学，有六个班级，三百多学生。县督学孙蔚民兼任校长。郭村地下党负责人蔡公杰同志也在这里任教。当时学校的抗日民主空气比较浓厚。但由于国民党江都县党部委员侯彭寿也在该校工作，所以斗争很复杂。挺纵政治部民运队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也派人来学校开展工作。他们在学生中宣传抗日，讲战斗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和高年级学生交朋友，发展积极分子，很快地掌握了情况。不久就将全校学生组织起来，参加儿童团，并由全校学生（初级学生除外）民主选举产生团长一人，副团长二人，下设宣传、慰问、学生等组。我当时正在郭村小学高年级读书，学习成绩较好，被选为团长，副团长是田鉴泉和陈永昌。儿童团的架子虽然搭了起来，但是我们都是十多岁的小娃娃，不会工作，负责儿童团工作的民运队同志，经常来帮助指导。这位同志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样子也是个大娃娃，但他却很能干，我们非常羡慕他，有事就去找他商量。起初儿童团的工作只是学唱革命歌曲，接着就搞些宣传劳军活动。五月端午节这一天，我们分成三、四个宣传小组，到郭村的前、中、后巷和徐、杨二巷一面宣传抗日，发表演讲；一面征募粽子和咸蛋，慰劳部队。通过这些活动，队员们得到了锻炼，学会了工作，并使儿童团从校内发展到校外，不断成长壮大。

六月中旬，郭村保卫战的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学校内的抗日进步势力和反共顽固势力的斗争更趋白热化，对我们儿童团，特别是对高年级学生的争夺工作，也逐步激烈复杂起来。以蔡公杰为首的进步教师，不断找我们去上课，宣讲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倒退。可是以侯彭寿为主的老师寸步不让，也找我们去上课，贩卖什么“一个党，一个主义”，什么“国家至上，领袖至上”，什么“英雄造时势”，什么“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等反动货色。开始时学生莫名其妙，但很快就明白过来，再不去听他那一套反革命的鬼话了。侯彭寿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亲自出马，对我们儿童团几个骨干和寄宿的高年级学生，进行欺骗拉拢。平时老师在办公室吃饭，学生吃饭在自己的宿舍里。一天中午，侯一反常态，坚持要我们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吃饭，我们心想这家伙又要耍什么新花样了。果然不错，我们一碗饭未吃完，他开腔了。开始他问我们：“究竟国军好还是新四军好？”我们说：“新四军好。张济传（国民党江都县长）的常备队住在郭村，欺侮老百姓，敲人家竹杠。新四军住在群众家里还帮人家扫地挑水，走路也为老年人让路。”侯狡黠地笑笑说：“这些是杂牌军，老中央的嫡系部队比新四军还好。”并乘机将蒋介石吹捧了一番。他企图钻我们未见过反动派主力部队的空子，破坏我们与新四军的亲密关系，还胡说什么，新四军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国家统一团结等等。我们随即把他的这些活动，向挺纵民运队的同志汇报。民运队同志指示我们要注意他的言行。眼看儿童团不能为其所用，侯彭寿又换了一副嘴脸，公开讽刺、打击、威吓我们，甚至百般阻挠、刁难、干预我们儿童团的活动。在民运队的协助下，我们儿童团召开了一次

有全校师生参加的大会，揭露了侯彭寿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反共倒退丑恶行径，撕破了他们的伪善面目，鼓舞了进步师生，教育了中间群众，孤立了顽固派。从此我们儿童团搬掉了绊脚石，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从校内走向社会。在郭村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配合各群众团体，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支前，站岗放哨等活动。不久郭村保卫战打响了，留下的儿童团团员继续坚持斗争，在战斗中为部队带路、送信、扛子弹、抬担架、慰问伤病员，和郭村人民并肩战斗，为保卫郭村吃苦流汗，作出了不少贡献。

硫磺脱险记

孙竹波

日寇投降，内战又起，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疯狂地部署数百万大军，向我解放区蚕食进攻，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一九四六年春，风传蒋军李天霞的一百军将要进驻我大桥镇。这突如其来消息，使全镇商民惊惶失措。当时我党在这里设有地下联络站，这个联络站设在以王晋卿（王秉华之父）大太爷名义开设的大生盐行，王定宇同志负责联络站工作，公开身份是盐行管事。其中还有两个工人，一个叫张健（已故），一个是我堂弟孙兴荣（现任二姜公社王野大队会计）。由于王定宇接到组织上的确切情报较迟，经过这里转运的八百多斤硫磺已不能转移出镇，事急势危，定宇找我商量应付办法。他告诉我这批“货”是给河北我手榴弹厂买的，江南的同志搞到手极不容易。由于沿江港口码头封锁很紧，出口时还是用绳索吊挂在船底才偷渡过江的，运抵大桥实非易事。总之，第一，硫磺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第二，联络站更不能暴露。怎么办？我们认为“货”一定要暂时转移出联络站才成。但大白天如何转移呢？在镇上又能转移到何处呢？正在几费踌躇之际，我忽然想到县货管局有二千多斤小盐存放在我们酱园里。县货管局的盐既然大明大白运进我店，为什么这些硫磺不能充着小盐运去，同时我们酱园一年到头要进盐的呀！于是决定将硫磺套上麻袋和小盐麻袋混在一起拉出联络站。然后又研究了将硫磺放在何处的问题。我提出

将硫磺转移到我工作的宝丰酱园为好。因为这个酱园很大，房子很多，前后有六进，第五进之后是一个放酱缸的大院，有酱缸一百多只，而硫磺只有几袋，隐藏在酱缸群里，谁也弄不清，定宇当即表示赞成。这样安排后，定宇叫我先回酱园作好准备。我立即回到店里后大院，选择近厕所一排空缸，并将不用的一叠旧芦席准备好，然后回到前面店堂，装着安闲无事的样子，等待着运货车子的到来。不久，货车来到，随即抬进后大院下缸，盖好旧芦席，严严实实，毫无破绽。

以后我的心里总是不能平静，想到别处去避几天风。于是对店里管事的赵老讲，要回二娘老家看看。到家后关照我父亲说，要去泰州替店里进批萝卜干，如有事可到泰州陈德兴酒店找我。这样我就离开了大桥镇。约二三天后，我父亲来泰州找我了，他说赵老先生派人到我家叫我把店。我问明店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才放心，说明硫磺的问题没有暴露，就决然回到大桥。当天管事的赵老走进我的住房低声告诉我：“吴区长（国民党五区区长吴高富）来找过你两趟，叫你回来后就去区公所一下。”赵老并十分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镇静地告诉他：“没有事，我就去。”

当时国民党区公所设在徐四房徐辅宜家中，我在区公所办公室见到吴高富，他领我进了他的宿舍就责问道：“我回来了，你为什么跑掉？为什么怕我们？”我回答是去泰州替老板进萝卜干，不信可问管事的。他指着一张椅子叫我坐下，接着又讹诈说：“揭发你的材料一大搭子，新四军撤走时有哪些东西交给你的？”我一口咬定没有。他又提高嗓门吼叫说：“孙竹波，你弄清楚，你不是有钱的大老板，我姓吴的不会敲你的竹杠！”我还是申言没有，并说：“你说有，你指明我究竟拿了新四军什么东西，就是叫我死，也口服心